

《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结构与民族精神表达

廖心童

陆军工程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0

DOI:10.61369/EIR.2025040017

摘 要：《黄河大合唱》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背景深受民族危难与救亡图存思潮影响，本研究旨在采用音乐学分析方法，深入分析该作品如何通过其音乐结构剖析乐章布局、旋律进行、和声配置及节奏动力等结构性元素，并结合歌词内容探讨音乐语汇与民族主题的融合机制以承载与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研究表明，作品以丰富的音乐戏剧性手法和鲜明的民族音乐语汇成功塑造黄河的象征意象，将个体的情感体验升华为集体的民族认同，极大地激发抗争精神与爱国热情，成为中国音乐史上艺术形式与民族精神高度统一的典范之作。

关 键 词：黄河大合唱；音乐结构；民族精神；音乐分析；抗战音乐

The Musical Struc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Its Expression of National Spirit

Liao Xintong

Army Engineer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Abstract：“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compo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adopt musicological analysis methods to examine how the work conveys and expresses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its musical structure. By analyzing structural elements such as movement layout, melodic progression, harmonic configuration, and rhythmic dynamics, and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musical language with national them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yric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work successfully shapes the symbolic imagery of the Yellow River through rich musical dramatization and distinct national musical vocabulary. It elevates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to a collective national identity, greatly inspiring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and patriotic fervor, making it a exemplary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where artistic form and national spirit are highly unified.

Keywords：“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musical structure; national spirit; music analysis; war of resistance music

引言

创作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危急关头，当时中国社会弥漫救亡图存强烈氛围且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并运用艺术形式唤起民众抗争意识背景下的《黄河大合唱》，源于诗人光未然在黄河险峡激流中目睹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场面深受震撼而创作出的长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于延安窑洞中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这部诗篇为基础谱写出此恢弘巨作。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和精神象征，其雄浑磅礴自然形象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民族气节相契合，为作品提供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作品诞生之初就承载特殊时代使命，通过音乐艺术凝聚民族力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音乐作品之一。

一、《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背景

（一）历史与社会背景

《黄河大合唱》诞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艰难的抗日战争相

持阶段，1938年至1939年间，中国大半国土沦陷，日军进攻势头凶猛，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核心城市相继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共产党则以延安为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整个国家弥漫着悲愤与救亡图存的强烈情绪，社会各阶层在“抗战到

底”的号召下凝聚起空前的民族意识。文艺界积极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艺术家们试图用最通俗又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唤醒民众斗志^[1]。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汹涌磅礴的自然形态与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使其早已超越地理概念，成为民族精神与命运的共同象征。光未然在黄河壶口瀑布目睹船夫与激流搏斗的惊险场面时，被这种原始的生命力与顽强精神震撼，意识到黄河正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奋起抵抗的完美意象。

（二）作曲家与创作过程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合作堪称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艺术共创，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在延安根据地因坠马受伤住院，期间根据此前带领抗敌演剧队渡黄河的经历创作出长篇组诗《黄河吟》。冼星海前往医院探病时读到诗稿，深受诗中磅礴的爱国激情与丰富的意象空间触动，主动提出为其谱曲。创作地点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间简陋的窑洞，条件极其艰苦，缺乏像样的乐器与谱纸，冼星海只得依靠一架老旧钢琴和自制的炭笔画谱。他连续奋战六天六夜，期间因过度疲劳数次昏倒，却始终被一种“必须为民族写出一部伟大作品”的信念支撑。音乐创作上，他创造性融合西方康塔塔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在《黄河船夫曲》中运用陕北大腔调与劳动号子节奏，在《黄水谣》融入江南民歌的婉转线条，在《保卫黄河》则以卡农手法模拟此起彼伏的抗战呼声。

二、《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结构分析

（一）整体结构与乐章划分

《黄河大合唱》采用西方康塔塔的大型声乐套曲形式，创新性地融合中国民族音乐叙事逻辑，形成八个乐章有机统一的宏大结构。作品以戏剧性思维组织乐章，形成“苦难描述—抗争爆发—胜利展望”的三段式叙事脉络。《黄河船夫曲》作为开篇，以急促的节奏与呼号式音调模拟船夫搏击风浪的场景，功能上既是序幕又是全曲精神基调的奠定。《黄河颂》采用男高音独唱与舒缓的广板节奏，通过绵延的旋律线条塑造黄河的雄伟形象。《黄河之水天上来》以配乐朗诵衔接前后乐章，增强文学性与画面感。《黄水谣》以女声合唱与流畅的三拍子描绘和平时期的田园景象，为后续苦难作铺垫。《河边对口曲》采用山西民歌对唱形式，以五声调式模拟民间对话，增强叙事真实感。《黄河怨》以女高音独唱与半音阶下行旋律表现悲剧性，形成情感转折点^[2]。《保卫黄河》运用卡农手法模拟浪潮般此起彼伏的战斗呼声，将情绪推向高潮。终曲《怒吼吧！黄河》以多声部合唱与复调手法整合主题，形成总结性颂歌。各乐章在演唱形式、调性布局与情绪设计上形成强烈对比，又通过“黄河”核心意象与主题乐思贯穿全曲，体现西方曲式逻辑与中国叙事美学的深度融合。

（二）旋律与和声特征

作品旋律创作深刻扎根于中国民族音乐传统，同时融入西方艺术音乐的展开手法。主题旋律普遍采用五声调式为基础，《黄河船夫曲》的核心动机源自陕北船工号子，以四度跳进（如 sol-do）与二度级进交替形成挣扎前进的听觉意象。《黄水谣》主旋

律融合江南民歌的婉转线条，以五声音阶的平稳进行表现田园意境。《保卫黄河》则运用北方吹歌乐的明朗音调，通过重复与模进强化斗争主题。和声语言上，冼星海并未完全遵循西方传统和声规则，而是大量使用五度叠置和弦、空五度和声与民族调式和声进行，例如在《黄河怨》中运用小七和弦与减五度音程表现痛苦情绪，在《怒吼吧！黄河》的终曲部分则以四度叠置和弦营造恢宏的音响空间。调性布局具有交响性思维，从 d 小调的黑暗色彩逐步转向 F 大调、降 B 大调的明亮调性，象征从斗争走向胜利。

（三）节奏与动态处理

节奏作为音乐的动力核心，在作品中承担了强烈的表现功能。《黄河船夫曲》通篇坚持固定的四四拍节奏型，但通过前八后十六、切分音等节奏变体模拟劳动号子的喘息感，配合 ff 到 pp 的突然力度对比，再现船夫与浪涛搏斗的惊险。《保卫黄河》以四四拍进行曲节奏为基础，但通过轮唱声部的错位进入形成节奏密度递增，象征抗战力量的不断汇聚。动态处理上，冼星海善于运用极端对比营造戏剧性。《怒吼吧！黄河》则通过声部叠加与力度累积，最终以全奏强收结束。节奏与动态的协同设计不仅服务于音乐本身的张力，更深化了民族斗争意象的表达，例如通过固定节奏型象征不屈不挠的精神，通过力度爆发模拟历史洪流的不可阻挡。

三、《黄河大合唱》的民族精神表达

（一）音乐元素与情感传达

《黄河大合唱》通过高度符号化的音乐语言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听觉转化，其旋律、和声与节奏设计成为情感传达的核心载体。旋律的民族性表达尤为突出，例如《黄河船夫曲》以四度跳进和短促音型模拟劳动号子，听觉上立即唤起集体抗争的联想。《黄水谣》则以五声性婉转旋律营造田园意象，而后半段通过小调化变形与半音下行表现国土沦丧的悲怆，形成强烈心理落差^[3]。和声语言上，作品突破传统功能性和声的局限，例如《黄河怨》中持续使用减七和弦，制造压抑紧张的情绪氛围，象征民族苦难的深重。而在《怒吼吧！黄河》终段，通过四度叠置和弦与明亮的大三和弦并置，音响空间骤然开阔，隐喻胜利的必然性。

（二）歌词与音乐的融合

歌词与音乐的融合是作品实现民族精神表达的关键机制，二者通过高度协同的叙事逻辑与情感结构相互强化。光未然的歌词本身具有强烈的意象性与朗诵节奏，例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中“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一句，冼星海以连续上行的琶音与强劲的打击乐模拟水势，使文字意象直接转化为听觉画面^[4]。《保卫黄河》中“风在吼，马在叫”的排比句式，则配以卡农式声部进入与进行曲节奏，音乐的运动感与文字的动势完全吻合。更重要的是，音乐时常超越歌词的显性含义而挖掘深层精神内涵，例如《黄河怨》歌词叙述一位妇女的悲惨遭遇，音乐却通过半音化旋律与扭曲的和声进行，将个人痛苦升华为整个民族的集体受难。终曲部分歌词呼唤“怒吼吧，黄河”，音乐则以赋格段处理，使各声部形成此起彼伏的呼唤与响应，象征全民觉醒的不可阻挡。这

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局部对应，更贯穿于整体结构，八个乐章的歌词从描述到呼吁再到宣誓，音乐则相应地从描摹性、抒情性迈向戏剧性与史诗性，最终在音乐与文字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从个体情感到民族精神的升华。

（三）民族象征与精神升华

黄河在作品中超越地理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音乐通过多重象征手法实现这一转化。首先，黄河的自然属性被转化为音乐动态，《黄河船夫曲》中以节奏与力度模拟激流险滩，听觉上再现黄河的险峻气势。《黄河颂》则以宽广旋律与丰厚和声表现黄河的博大深远，使河流成为民族历史的象征。其次，黄河被赋予人格化的斗争精神，《保卫黄河》中卡农手法造成的声部叠加模拟黄河浪涛的层层推进，隐喻民众力量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终曲部分通过调性转向与力度积累，将黄河从自然意象转化

为呐喊的主体，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言者。更重要的是，作品通过音乐凝聚了抗战时期的集体认同，演出时往往千人合唱，民众在齐唱“怒吼吧”时获得的不仅是审美体验，更是集体身份的强烈感知。这种艺术仪式使黄河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精神力量，激发“舍小我顾大我”的牺牲精神与抗战决心。

四、结语

《黄河大合唱》通过宏大音乐结构与深刻精神内涵完美实现艺术形式与民族主题高度统一，以多乐章康塔塔形式融合中国民族音乐语汇，经旋律、和声、节奏的象征性处理将黄河意象转化为不屈不挠民族精神载体。其音乐与歌词协同叙事不仅再现抗战时期集体记忆，更创造凝聚民族情感的艺术仪式。

参考文献

- [1] 闻之.《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最强音[J].文史春秋,2024,(11):51-54.
- [2] 吴姗姗.当代音乐欣赏视域下《黄河大合唱》的音乐欣赏方式[J].艺术大观,2024,(31):67-69.
- [3] 悦贺栋.《黄河大合唱》中的民族精神与艺术表现手法研究[J].黄河之声,2025,(04):12-15.
- [4] 辛苗苗,罗龙.《黄河大合唱》:民族精神的激昂颂歌与时代强音[J].新传奇,2025,(05):43-45.